

文物集刊

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3

文物出版社

文物集刊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3

文物出版社

北京

文 物 集 刊

(3)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81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19

书号：7068·830 定价：2.65元

目 录

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	《文物》通讯员 彭适凡 (1)
关于“几何印纹陶”——“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	苏秉琦 (10)
试谈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分期和断代	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 (20)
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几个问题的探索	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 (34)
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	邹 衡 (46)
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	蒋赞初 (52)
略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印纹陶	张之恒 (62)
印纹陶问题初探	王子岗 (70)
从江西出土“几何印纹陶”情况谈谈有关问题的看法	饶惠元 (77)
印纹陶与“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的问题	杜耀西 李作智 (85)
印纹陶与印纹硬陶	李辉柄 (89)
江南地区印纹硬陶质态问题	朱 江 (93)
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	安志敏 (98)
有段石砬、双肩石器和“几何形印纹陶”的有关问题	曾 琪 (106)
江西地区陶瓷器几何形拍印纹样综述	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 (110)
试论吴城文化	李伯谦 (133)
试论清江吴城遗址及其有关问题	商志禪 (144)
闽江下游印纹陶遗存的初步分析	王振镛 林公务 (152)

福建地区几何印纹陶分期初探	庄锦清 (164)
福建、台湾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关系	吕荣芳 (177)
昙石山遗址的分期和年代	吴绵吉 (187)
试谈黄土仑印纹陶器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	陈 龙 林忠干 (194)
广东几何印纹陶纹饰演变初步认识	徐恒彬 (203)
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	何纪生 (212)
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	朱非素 彭如策 刘成德 (225)
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	杨式挺 陈志杰 (234)
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分布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244)
略谈湖南出土的印纹陶	高至喜 周世荣 (253)
浙江的印纹陶——试谈印纹陶的特征以及与瓷器的关系	牟永抗 (261)
附录：绍兴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实验简报）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	陈显求 陈士萍 (270)
上海地区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期	黄宣佩 孙维昌 (275)
谈谈河南商周时期印纹硬陶及其有关问题	安金槐 (280)
荆蛮考	刘和惠 (284)

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

《文物》通讯员 彭适凡

辽阔的江南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肥沃的土地上。

在古代，地处我国东南部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创造并大量使用那种表面上拍印有各种纹饰（包括几何形图案）的陶器、釉陶器和原始瓷器。这就是考古学上所称的印纹陶，这种印纹陶在1914、1915年间首先在广东省南海县南越文王墓中发现，以后，各地都有零星的出土。解放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印纹陶在南方各地大量出土，因此，五十年代以来，我国文物考古界都把它作为代表江南地区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文化，被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或“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以区别于长江以北其它地区的原始文化。可是，许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南方各省区相继发现和发掘了很多重要的遗址和墓葬，它们的时代包括了商、周以至汉初，这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印纹陶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能不能把它定名为考古学上的一种文化？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怎样？江南各地区之间印纹陶的关系怎样？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又怎样？印纹陶生产者的族属是谁？等等，等等。

为了研究江南地区古代文化中的这些重大问题，探讨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历史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交流情况，交换意见，把这一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

向前推进一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共江西省委、省革委的关怀和领导下，由江西省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于1978年8月24日至9月3日，在庐山召开了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我国文物考古战线继1977年南京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登封夏文化讨论会之后又一次学术盛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和江西等省市的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的历史系考古专业，共二十二个省市，五十五个单位，近百名代表。

各地代表带来了上千件文物标本，提出了三十三篇学术论文和报告。讨论会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看标本，听介绍，在熟悉材料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各抒己见，着重讨论了上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南方地区考古研究工作中重大的理论问题。讨论会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勇于“放”，勇于“争”，又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一扫“四人帮”横行时期学术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整个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

—

什么是印纹陶？它具有哪些特征？因为

认识不同,概念不同,就关系到这种陶器产生、繁荣的时间和分布的地区,它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发表的文章便暴露出了严重的分歧,这次会议首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南方地区的印纹陶主要应从胎质上考虑,即是指的“印纹硬陶”,不宜称“几何印纹硬陶”,因为有的纹饰不一定是几何形图案。这种陶器的胎质之所以比一般的陶器坚硬,是因为它不是用普通的粘土而是用瓷土(有的称高岭土或坭子土,有的称为碎屑类耐火粘土)烧的,烧结的温度已经达到 1100°C 。而普通粘土的烧结在 $950^{\circ}\text{—}1050^{\circ}\text{C}$ 左右,超过这一温度就要烧溶、变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都是用瓷土烧制的,后来,在印纹硬陶的器表施上釉即成为原始瓷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江南地区的印纹陶纹饰除一般的绳纹、篮纹外,主要流行的是规整的几何形图案,因此,它的名称还是冠以“几何”两字而称之为“几何印纹陶”为好,这样好区别于中原和其它地区的印纹陶。同时,不能笼统地说南方地区的印纹陶都是印纹硬陶。事实上,赣、粤、闽等地很多火候较低的夹砂陶和泥质陶上就拍印有各种几何纹样。而且,软和硬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从陶器发展工艺考察,硬陶是制陶技术发展一定阶段时产生的;而在硬陶产生后,软陶仍继续烧造。过去把一些遗址划分出砂、软、硬的迭压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印纹硬陶有的是用瓷土烧的,有的也不一定。同样的粘土,烧制的火候不一样,陶器的软、硬也就不同,关键还是窑炉结构和烧造技术。用瓷土还是用粘土,常常是就地取料,因地制宜。如上海地区烧制的印纹硬陶和泥质灰软陶的陶土就基本一样。釉是古代先民在长期制陶实践中发现和发明的,施在粘土烧制的软、硬陶上似应称釉陶,只有施在瓷土烧制的硬陶上才能称为原始瓷。

过去把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笼统叫做“印纹陶文化”或“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来命名。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相继沿用。这在过去考古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有了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如果继续把印纹陶作为南方地区古代文化的代表,那就会造成混乱,会给南方地区古代文化的研究带来困难和阻力。因为大量新的考古资料证实,几何印纹陶仅仅是南方古代物质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而且,其分布范围达数千里,各地区的面貌不尽相同,延续时间又至数千年,经历了原始社会晚期、奴隶制社会直至封建社会初期等几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新发掘出的材料来看,在奴隶制社会阶段,这个地区的青铜器文化同中原地区一样,也是很发达的。因此,用印纹陶文化这个名称,确实不能代表南方地区诸种文化遗存的全部内涵。大家经过认真的讨论,都赞成将这一名称废掉。

“几何印纹陶文化”这个名称废弃后,有没有必要给予新的统一的文化命名?大家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不宜用统一的文化命名,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将各地区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分别命名,如广东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和江西的“山背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这样定名,是符合今天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的。

可是,对于南方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一些青铜文化如何命名的问题,情况就更复杂得多,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的中原地区最早进入阶级社会。早在奴隶制的商代,它高度发达的文化已浸润到长江以南。如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陶器,上面的刻划的陶文不少和中原的一样,陶器本身也有很多具有郑州二里冈的因素,它应属商文化的一支,甚至有可能就是商的一个方国,因此,叫“吴城文化”不一定恰当,可逕直管它叫“吴城商代遗址”。又如苏南地区的青

铜文化，既然已发现了宜侯矢鬲，说明是周的封国，为什么还要叫它“湖熟文化”呢？有的同志则认为，考古学文化虽然一般用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但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些有代表性的遗址，当时可能并不在商周的管辖范围之内，它的文化面貌确有显著的特征，而一时又不能确定它的族属的情况下，也还是可以用它来为文化命名的，诸如相当中原商周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就是。不能因为江西吴城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的大体一样就认为是商文化，这正同周武王以前有部分青铜器和商的作风完全一致，但却不能把周武王以前的文化定为商文化一样。这是因为我国土地辽阔，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南方像商的青铜器，它的时代不一定与商代同时。最容易判别某一地区某一文化特征的是陶器而不是青铜器。吴城的陶器虽然有某些与中原相似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富有土著特色的陶器组合群，在出土的文字、青铜器的铸造等方面也都有其自身特点。因此，可以单独命名为“吴城文化”。“湖熟文化”的地方特点也是主要的，其文化命名同样也可以成立。

二

我国江南地区印纹陶是怎样发生、发展？它们的序列如何？怎样分期？大家在接着印纹陶的特征的探讨之后就这些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总的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江南地区印纹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相当中原的商周时期，衰退于战国至秦汉；它的发展鼎盛以至衰退，大体与商周青铜器工艺的盛衰一致。

大量发掘材料表明，印纹陶出现于江南地区某些新石器晚期遗存中。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第Ⅰ、Ⅱ期墓葬和下层，福建闽侯昙石山中、下层，榕岸庄边山下层，以及江西的修水山背下层、清江筑卫城下层诸遗址中，都数量不等地出现了拍印的几何印纹陶，常

见的是方格纹、圆圈纹、圆窝纹、漩涡纹、网结纹、曲折纹和席纹、叶脉纹等，而且都显得重叠紊乱，深浅不一，形状不定，表明拍印技术还处于初期阶段。在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中有否早期印纹陶的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江苏、浙江、上海一些同志认为，良渚文化中没有发现印纹陶，上海马桥中层（四层）出土的大量印纹陶看不出是从下层的良渚文化演变出来的。有的同志则认为，尽管在很多良渚文化遗存中不见有印纹陶，但在吴兴钱山漾下层和邱城中层各自的一件黑陶竹节豆柄上，分别发现有戳印的接近马桥中层的云雷纹和圈带状的重菱纹，在钱山漾下层的泥质黑陶和灰陶上，也发现有少量的方格纹、竹编纹、水波纹和圆圈纹等，这些应该就是早期的几何印纹陶。但他们同样认为马桥中层的印纹陶不是直接从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可能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环节。

至于印纹陶是怎样出现的？多数同志认为，最初是由于手制陶器、特别是用泥条盘筑法所制的陶器需要经过拍打陶胎，使其致密、耐用，陶拍上捆扎的绳索等就在陶器表面上留下了印纹，也就是说工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器物，在实用之外，还要求美观，于是印纹逐渐规整化、图案化，装饰的需要便逐渐成为第一位的了。早期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源于生产和生活。这是从展出的大量纹样中得到证明的。例如常见的编织纹，就与南方地区盛产竹、苇、藤、麻之类的编织物有关。叶脉纹是树叶脉纹的模拟，水波纹是水波的形象化，云雷纹导源于流水的漩涡。也有同志认为，几何印纹陶纹饰虽然有的来源于生活，但更多的几何形图案是同古越族蛇图腾的崇拜有关，如漩涡纹似蛇的盘曲状，水波纹似蛇的爬行状，等等。

与会同志同意这样一种意见，江南数省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封建社会初期的诸种文化遗存之间，都可以看到它们有不少共同的

特点，印纹陶就是其中的特征之一。说明在距今七、八千年到二千年前的漫长岁月里，南方各地区诸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的密切和频繁。这是一方面的情况，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南方地区幅员辽阔，文化的发展错综复杂，也很不平衡，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共性，也要看到它们各自在古代文化发展中的个性，即每个地区自身发展的序列。问题是如何划分，才能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的同志主张把古代的南方划分为六个地区：（1）太湖地区；（2）宁镇地区（包括皖南）；（3）鄱阳湖—赣江流域；（4）福建、浙南和粤东地区；（5）广东地区；（6）湖南地区。也有的同志主张划分为四个地区：（1）江、浙、皖地区；（2）闽、台地区；（3）两广地区；（4）赣、湘、鄂地区。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前一种分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还有的同志补充提出，闽江中下游和浙南以及闽南和粤东，似乎可分别划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从粤东近年发掘的饶平墓葬，以及闽南等地出土有近似饶平墓葬的大型石戈来看，很有可能粤东和闽南有着一种内涵与闽北不尽相同的青铜文化遗存。

各省区的同志还初步排出了自己地区的古代文化发展序列。多数同志认为，福建、江西地区的印纹陶发展序列是比较清楚的。福建的同志根据遗址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的分析比较，将闽江下游印纹陶遗存的发展序列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昙石山下层为代表，年代相当马家浜文化或稍晚；第二阶段，以昙石山中层、白沙溪头、东张下层为代表，年代与良渚文化相近；第三阶段，包括昙石山上层、东张中、上层、浮村以及黄土仑遗存，时代为商末周初。上述三个发展阶段，是同一系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第一、二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而第三阶段则跨入了青铜时代。江西的同志把赣省地区印纹陶的发展序列分为：（1）发

生期，以修水山背下层和清江筑卫城下层为代表——新石器晚期；（2）发展兴盛期，以清江吴城遗址、九江磨盘墩遗址等为代表——商代中期到春秋；（3）衰退期。以九江大王岭遗址、新干界埠粮仓以及清江观上等墓葬为代表——战国。

江苏的同志对长江下游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湖熟类型”前期（代表长江下游丘陵地区）和马桥类型（代表太湖水网地区）两种，时代约当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中期：以“湖熟类型”后期一种为代表，时代相当西周；晚期：以上海金山戚家墩遗址为代表，可称为“金山类型”，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这期是长江下游地区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全盛时代”。

南京博物院的同志还着重对苏南普遍存在的土墩墓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期。他们认为，土墩墓是长江下游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土著文化遗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期：第一期，约当中原西周早期；第二期，约当中原西周中、晚期；第三期，约当中原春秋早期；第四期，约当中原春秋中、晚期；第五期，约当中原春秋晚期。从拍印纹饰发展的全过程看，他们认为第一、二期是属于繁荣期，纹饰种类多达十余种，既有仿铜器的云雷纹、变体云纹，又有本地特色的编织纹等；而第四、五期纹饰日渐单调，表明已开始进入衰退期。考虑到苏南土墩墓的文化面貌确实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而且分布范围又如此广泛（包括上海市、浙江北部和皖南的部分地区），因此，江苏和安徽一些同志提出，宜继续沿用“吴越文化”的名称，这种文化或许就是古代荆蛮族的土著文化。对江苏地区的分期序列，有的同志提出，土墩墓和湖熟文化的关系尚不清楚，湖熟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整理。

上海的同志对上海地区几何印纹陶遗存分了三期。第一期：遗址有上海的马桥、亭

林、查山中层、浙江钱山漾、水田畈的上层等，时代相当商代；第二期：遗址和墓葬以上海亭林上层、崧泽上层、寺前村中层以及江苏无锡荣巷M10、华利湾古墓、溧水周墓等为代表，时代相当西周；第三期：以戚家墩下层为代表，时代为春秋至战国早期。这三期的文化遗存，大体反映了这样一个史实：大约在夏商时代，上海的近邻宁镇地区已分布着一种以鬲为主要炊器、与商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湖熟文化时，这里还保持着一种与浙闽地区相一致的、以鼎为主要炊器的越族土著文化——第一期印纹陶遗存。商代晚期，苏南一带已是吴国的属地，吴的势力逐渐到达上海地区，因此，西周时期上海地区的印纹陶有着与镇江等地一致的特征，到春秋末，越灭吴，而后楚又灭越，所以，从第三期印纹陶遗存来看，整个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更趋一致。楚灭后，印纹陶基本消失。

广东地区古代文化发展是自成体系的，但由于过去调查的材料多，发掘的典型材料少，新发掘的石峡中层的完整器物又不多，因此这一地区商至西周一段的文化面貌至今还不很清楚。但根据现有资料，也大体可以说明广东地区的几何印纹陶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鼎盛、衰退直至消失的过程，同样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三个历史时期。广东还有的同志把它分为四个时期和四个相对的阶段，即出现期——原始方格纹阶段，唯一的是在新石器早期的英德青塘洞穴遗址发现；发展期——曲折纹阶段，典型遗址有新石器晚期的石峡下层和中层，增城金兰寺下、中层以及佛山河宕遗址等，其绝对年代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鼎盛期——F纹（即夔纹）阶段，典型遗址为石峡上层，时代约当西周晚至春秋，距今约三千年到二千四百年；衰退期——米字纹阶段，典型遗址有增城西瓜岭和始兴白石坪等，时代相当于战国。

对广东地区上述分期分段，也有同志持

不同意见，认为距今五、六千年前如潮安陈桥一些沿海贝丘遗址中出现刻划的曲折纹、山形纹和横断条纹还只是广东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孕育或萌芽期；距今四千三百年至五千年前的石峡下层和Ⅰ期墓葬中出现拍印的重圈纹、漩涡纹、曲折纹和方格纹等，才是广东几何印纹陶的真正出现期。上述所谓发展期延续时间太长，规律也不甚明了，且石峡下层与中层、佛山河宕诸遗址的文化内涵的差异较大，因此，有必要细分为初步发展期和比较发达期，前者以石峡中层为代表，即过去统称为“几何印纹软陶”的遗存（其实后期已出现了不少质地坚硬的印纹硬陶），距今三千五百年至四千五百年；后者相当商代中、晚期至西周中、晚期，至今在层位迭压上虽未找到典型的遗址，但应包括过去统称为“几何印纹软陶”时期年代较晚的那些遗址，时代为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到二千八百年。此外，还有的同志认为，从石峡中层和河宕诸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析，其性质不可能是新石器晚期，也不能早到相当中原的夏代，而应是相当中原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文化遗存，因此，他们对广东地区印纹陶的产生期与发展期的代表性遗址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产生期，以石峡中层、Ⅱ期墓葬和金兰寺下层为代表，时代为新石器晚期；发展期，以石峡中层，佛山河宕上层、南海灶冈等遗址为代表，时代为商代中期到西周。对于岭南地区印纹陶的鼎盛期和衰退期的划分和断代，看法上则是基本趋于一致的。

三

在讨论江南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分期和断代基础上，同志们又对江南各地区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同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and 发达的文化。从很早的古代起，我国大

江南北之间的古代先民们，就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中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高度发展的商周青铜文化曾给了南方以强烈影响；同时，南方古代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被中原文化所吸收。它们之间相互交往融合，共同缔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共同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具体讨论南方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多数同志认为，在新石器晚期阶段，南方各地区之间的相异性是主要的，所以可以分别划属不同的原始文化系列，诸如良渚文化、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或山背文化等。但是同志们也指出，它们之间在文化内涵的某些方面又有着共同因素：首先，在生产工具方面，都有数量不等的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斧和常型石锛、石斧伴出（中原多为椭圆形石斧），还普遍出土有体型细小的石器。有段石锛的段部都比较明显凸出。有肩石斧在广东增城以西和南部地区特别盛行，福建出土也较多，唯赣、浙较少。其次，在陶器特征上，较普遍的是以夹粗砂陶为主要陶系，还有不等的类似良渚式的黑皮陶和薄胎黑陶。器物多圈足器和三足器，炊器以鼎、釜为常见。鬲形器在江西山背、筑卫城和广东石峡遗址中都有出土。第三，在经济生活上都有着比较发达的耨耕农业，普遍已能种植人工栽培稻。这些文化面貌上的共同因素，生动地表明南方地区的古代先民，从很早起，就相互交往，相互学习，以自己的血和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同开拓着伟大祖国的江南。有的同志特别提出，福建昙石山中层的粗砂灰陶、橙黄陶及少量印纹陶、彩陶的文化层与台湾高雄林园乡凤鼻头贝丘遗址第三、四文化层出土的橙红陶和彩陶、红陶极为相似，表明了闽、台两省滨海地区的原始氏族部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往来。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江南各地区之间文

化面貌是共性为主还是个性为主？一种看法，认为共性为主，理由是：中原最早进入阶级社会，高度发展的夏商周文化给予了南方强大的影响，因而南方诸原始文化逐渐融合，更多地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的一致性，所谓吴城文化、湖熟文化都是与中原相近似的青铜文化。另一种看法，认为仍然以个性为主，理由是：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尽管在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文化面貌表现出的共同因素更加增多，但总的看，自身特点还是主要的。以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为例，炊器前者以鼎为主，后者以鬲、甗为主。以吴城文化和湖熟文化来说，吴城流行的折肩作风以及甗形器、复钵状器盖、马鞍形陶刀在湖熟文化中不见，而湖熟文化中带流的鬲在吴城又不见；吴城的几何印纹陶和釉陶、原始瓷较为发达，而湖熟文化前期阶段的印纹陶却很少见，湖熟文化中的梯形格纹、瓣形纹、贝纹在吴城也不见。因此，把南方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古代文化笼而统之来谈，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也是不利于对南方古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的。只有先分地区、分类型地深入研究，才能综合地全面地揭示出整个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

关于江南地区古代文化与中原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同志们指出：中原最先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从未间断。在此后的任何一个时代，边远地区的文化都没有超过中原。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曾给了边远地区以巨大的影响，江苏湖熟文化及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中有鲜明的商文化因素就是有力的证据；广东饶平墓葬和福建东张上层等地出土的直内青铜戈、石戈以及南安大盈出土的Ⅱ式铜戈，明显反映出有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特点；上海马桥中层出现的仿青铜器的陶觚、觶、尊、簋等，似与偃师二里头的早商文化有密切联系。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南方各地受中原影响也是

程度不一的，首先受商文化影响的是邻近长江的几个省区，吴城文化遗址处在第一线，受影响特别深，而闽、粤等地处于第二线，受影响就要少些。

尽管中原影响江南是主流，但同志们也认为，文化交流从来就是相互的，在古代历史上，各民族部落和民族间的交往过程中，先进民族更多地影响后进民族，但后进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也会被先进民族所吸取，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商周时期，南方文化中的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的制造技术就传播到了中原。河南的同志在反复揣摩了南方各地的印纹陶标本后认为，无论从胎质、釉色及釉底的纹饰（包括云雷纹、绳纹）来看，郑州的几何印纹陶和南方的一模一样，而二里冈出土的印纹硬陶只占整个陶器的百分之零点零五（万分之五），在江西吴城第一期（相当二里冈上层）文化中却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此外，在河南淅川下王岗下层^②（龙山文化向洛达庙早期的过渡期）出土了唯一的一件器身饰叶脉纹的泥质红陶罐，无论从胎质、造型和纹样看，都与中原作风很不协调，这些都足以表明中原印纹陶的烧造技术确是受了南方的影响。

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原的文化领先，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可是，在原始社会时期，南方、北方的文化发展程度究竟怎样，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一种观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就不一定比南方发达。以中原夏商青铜器上流行的云雷纹来说，虽然在山东城子崖晚期龙山文化中多次出现过刻划的兽面纹和云雷纹，但在绝对年代比龙山晚期还早的江南张陵山、河姆渡第一层、钱山漾下层和邱城中层等一些早期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现有刻划兽面纹和墨绘、戳印的云雷纹。如果这些材料确凿的话，显然在这个时期，主要应是南方文化影响了北方，而不是相反。再如，玉琮是夏文化中一种重要礼器，殷

商时期更趋发展，觚形器则更为殷商时期一种特有的礼器，这些在中原新石器晚期文化中找不到它们的来源，然而在东方沿海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广东石峡Ⅱ期墓葬中则有更多的出土。当然这关系到夏文化的起源问题，同志们都认为值得深入研究。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比南方文化进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过去认为华南的绳纹陶产生最早，随后传播到了中原及更北的地区。可是近年在河南裴李冈和河北磁山先后发现七千年前的新石器较早的文化遗存，在磁山遗址中就出土有百分之三十的绳纹陶，还有彩陶，并发现了小米，说明已有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可是华北绳纹陶的产生并不很晚，不一定是受南方的影响。史实既然证明中原最早进入了阶级社会，它的青铜文化又那样高度发达，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发展的结果。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中原某些纹饰是从南方传播去的，如云雷纹，就很难肯定是南方出现最早，因为年代还卡不准。只有商的年代是准确的，所以还是南方文化受北方的影响可能性更大。持这种观点的部分同志，还对浙江河姆渡遗址下层的年代（距今约六—七千年）提出怀疑。

四

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发展兴盛时期的社会性质怎样？它们的生产者是什么族属？会议对这些问题也交换了意见。

考古科学不是为考古而考古，而是为了研究古代的社会历史。探讨印纹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复原江南地区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弄清楚它的先民的族属，从而揭示出南方地区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及其与华夏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这是与会同志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在具体探索几何印纹陶发展兴盛时期南方地区的社会性质问题时，少数同志认为，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不完备的情况

下,很难讨论这一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尽管目前资料不很充分,但也有种种迹象可资探索。例如在湖南地区,从出土的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和发现有同中原一致的石门皂市、浏阳樟树潭等商代遗址来看,至少在商代中晚期该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在广东,几何印纹陶分布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大约从春秋开始(即夔纹陶阶段),主要根据是,广东至今发现的青铜器,较多的出土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墓葬和遗址中,仅清远两座墓,四会鸟旦山墓和罗定墓共出青铜器就达二百六十件,其中有成组的礼器编钟和二百零一件兵器,显然这些墓主应是奴隶主贵族。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粤东饶平墓葬出土的石戈和同一地层中出土的青铜戈以及制陶技术水平来看,可能在相当中原的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就已进入了青铜时代。持这一看法的同志,有的还指出,粤北石峡中层、佛山河宕和南海灶冈等遗址,尽管目前尚未发现青铜器,但从几何印纹陶的特别发达和制作、装饰技术所反映出的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来分析,似乎不可能还停滞在新石器晚期阶段。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尚有待进一步发掘来证实。

主张将福建地区几何印纹陶发展系列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同志,认为第三阶段已跨入了青铜时代,年代约当晚商到西周。根据是第三阶段的东张上层已发现有少量青铜器,昙石山上层和黄土仑遗存目前虽未发现青铜器,但从陶器的造型和装饰特点看,也具有明显的仿铜器作风。也有的同志主张,南安出土的一批西周青铜兵器,才是进入青铜时代的有力证据,因为青铜兵器和玉器这样集中出土,不仅反映了墓主可能是统治者贵族,而且表明了在西周时期,偏远的福建地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达到质的飞跃。

能反映出长江下游地区几何印纹陶发展时期是处于奴隶制的材料较多。主张这一地

区几何印纹陶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的同志,认为属于早期的湖熟文化早期类型(指分布在长江下游两岸丘陵地区)和马桥类型(指苏南浙北的太湖水网地区)就显然已是青铜文化,时代约当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有的同志举出南京西善桥太岗寺墓葬材料为例,属上层的五具骨架中,M1仅有头部;M2无头,侧身屈肢,足部并在一起;M4无头,下肢骨交叉在一起。这种头、肢不全的现象,表明死者是杀身之后被埋的。这些累累白骨应是奴隶们被杀殉的有力证据。再如在苏南句容、溧水以及皖南屯溪等地都先后发现有较大型的奴隶主墓葬。丹徒烟墩山出土有宜侯矢鬲的贵族墓葬,更可以想象西周时期苏南和皖南地区奴隶制的发达情况。

多数同志认为,鄱阳湖——赣江中、下游地区,至迟到商代中期开始进入奴隶制的证据也是比较确凿的:(1)陶器、釉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烧造,特别是青铜器的铸造已有较高的水平。(2)新干西周前期大墓,出土有大小有序的青铜列鼎五件和其它铜甗、铜爵以及三十余件几何印纹陶器,墓主显然是奴隶主阶级。(3)吴城文化遗址中不仅出土有戈、矛、镞等青铜兵器,还出土了成批生产用的石质镞范、戈范和钺范,专门武器的成批生产,无疑也是阶级社会才有的。

(4)吴城遗址中出土有刻划文字和符号计一百五十个,几乎占了目前南方出土古代文字总数的一半。文字发明和较广泛的运用,也应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南方几何印纹陶所代表的古代族属问题,也是会上争辩的一个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完全根据考古材料来定族属,因为同一考古文化不一定就同属一个族,不同的族不一定就不是一种考古文化。现在进行探讨,只能根据古文献史料,但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其中有些是伪书或传说,诸如《竹书纪年》、《逸周书》等。春秋战国时代记述两千多年前的史事,不一定确切可靠,因此,

目前族属问题尚不好谈。另一种观点认为，考古文化与族属不能划等号。但一般情况下，族属和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考古文化仅是代号，还得研究族属；族属搞清楚了，就可取消文化的代号，古代文献和古史传说，有的虽不是信史，但也不全是无稽之谈，它常常反映出若干史影，我们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中仍然可以了解到一些史实。《逸周书》过去认为是伪书，近年陕西出土西周初年的利簋铭文，记载有周武王伐商的史实，就和《逸周书》的记载相吻合。所以对待古文献，不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关键是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印纹陶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族？多数同志认为是古越族。有的同志指出，《史记》、《战国策》、《韩非子》、《墨子》、《左传》、《尚书》、《淮南子》等古籍中关于古三苗族的记载是可信的。我国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的三苗氏一支确在南方，其活动范围正是几何印纹陶的主要分布区域。自夏以后，三苗集团中的一支越族特别兴盛起来，但是越族内部，种别繁杂，社会习俗和文化特征也不完全相同，因而有“百越”之称。江南地区在几何印纹陶发展兴盛时期各类型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就正是古越族种别繁杂的反映。还有的同志指出，在南方的一些几何印纹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的文字和符号约计三百多个，其中有数十个与中原出土的一样或相似，相当一部分则不见于中原。说明古代的南方，有着与中原不完全相同的文字体系。这些文字极有可能就是广泛分布在南方地区的古越族人民的文字。但是，也有部分同志认为，几何印纹陶分布范围如此之大，古代文化面貌又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不一定就只有一个族。如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南部以及浙江、上海的部分地区，从埋葬习俗方面盛行平地起封、无圻穴筑墓法来考察，则又很有可能是属于荆蛮族了。

经过争论，大家较一致地同意这样的意见：族属问题是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又是十分

复杂的问题，必须把古代文献、古史传说和考古发掘资料结合起来，从体质特征，埋葬习俗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综合地探究，才能逐步求得问题的解决。

在讨论过程中，同志们还结合具体考古材料，回击了苏联御用文人及其追随者在南方古代文化研究上散布的种种荒谬观点。近年来，苏联和越南的一些所谓“考古学者”，为了适应其霸权主义、扩张政策和排华、反华的需要，竟不择手段地歪曲和篡改考古材料，胡说什么“长江以南是一个非中国人的文化区”，“中国南方的远古文化发源于中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等等，妄图以此来分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那只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而已。

粉碎“四人帮”，学术大解放。这次学术讨论会提出的问题，很广很深。代表们普遍反映，这次会议，通过对一些典型的古文化遗址的剖析，排出了南方一些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系列，初步勾画出了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可以说，它是三十年代以来，南方印纹陶问题研究的一次初步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南方关于印纹陶问题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一次大检阅。

会上，同志们还对南方地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希望。大家认为，几年来，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仍有不少薄弱环节，如在文化发展系列上，纵的有时间上的缺环，横的有地区上的空白。吴城遗址的发现对南方古代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吴城也仅仅是一个点。今后必须加强协作，共同努力。同时，考古学的研究也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密切注意和掌握国外考古学研究的新动向，新成果。代表们表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在这繁花似锦的大好春天里，刻苦攻关，勇于探索，努力在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中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1978年10月

关于“几何形印纹陶”

——“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

苏秉琦

一

1978年8、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是1977年10月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继续。两次会议讨论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我们不妨说，他们所要探索的主要课题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大体一样的。这就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从原始社会到阶级国家产生、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课题，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贡献。从历史民族文化区系的观点来看，我国东南几省关系密切。对于这一地区到秦汉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以前的历史，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科研项目来进行研究。

1977年的“南京会议”我参加了，获益不浅。1978年的“庐山会议”我因病未得参加，深感遗憾。读到了会议期间印发的材料，虽然未能亲自听到讨论发言，看到为会议准备的实物展出，但仅仅这些书面材料也足以说明：最近几年，特别是过去的一年中，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和对有关问题的探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我感到高兴，受到鼓舞和启发。这里仅仅就翻阅讨论会的材料随手作的笔记，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权当会议的补充书面发言。

二

会议名称是“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我意不如用“几何形印纹陶”较好。道理很简单，前者含义太广泛，后者照字面解释仍嫌广泛，但总比较贴切一点。

“印纹陶文化”或“几何形印纹硬陶文化”等名词过去用过，现在大家多认为不妥，我意也如此。但是，“几何形印纹陶”，作为一种重要文化特征因素，曾经在我国东南几省，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以前存在过，却是事实。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不宜用它作为一个考古文化的名称。不宜把它作为一个考古文化的名称是一回事，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讨论的课题是另一回事。从近年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大量资料来看，恰恰是它，而不是别的，可以当做一把“锁钥”，帮助我们打开通向探索我国这一重要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文化史这一重要历史课题的大门。实践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以把它比做一条牵牛的绳索，我们正是沿着它看到了这头牛的鼻子、头面的轮廓。当然，这虽然仅仅是前进中的一步，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三

在这一涉及地域广阔、时间漫长、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范围内，普遍含有的“几何形印纹陶”这一文化特征因素中具有典型性

意义的“几何形印纹”是哪些呢？试归纳分类如下：

第一类 用印模戳打的阴纹或阳纹的圆点、圆圈、圆点圆圈、重圆圈等。

第二类 用印模拍印的阳纹或阴纹的平行线、平行曲折线、雷纹、各种变形雷纹等。

第三类 用印模拍印的阴纹或阳纹的方格纹、复线方格纹、回字纹、各种交错重叠的方格纹（包括流行最广的所谓“米字纹”）等。

以上三类不能说包括了全部可以称作“几何形印纹陶”的纹饰，但可以说包括了可以称作“几何形印纹陶”纹饰的绝大部分，而这样的分类方法则便于我们对这种特定制陶工艺技术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从而也便于我们对与它相关的诸学术问题的分析研究。

四

根据目前工作所积累的资料，企图对于涉及如此广大范围内的古文化进行全面的区系类型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困难，还难于深入。但我们不应该等待，既不应把它们囫圇吞枣地当做一回事，也不应把它们看做杂乱无章的一群，无条理可循，应该依据现有资料所提供的若干个点作基础，把它们联结成线，联结成面，联结成有机的整体，并以此做为深入研究这一整个地区古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出发点。我的初步看法是，可以暂把它试分为如下的几大片：

（一）从鄱阳湖、赣江到北江（即包括江西和广东中部）是它的关键（枢纽、核心）地区。

（二）从太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沿海一带（包括台湾省等）是它的东南翼。

（三）从洞庭湖、湘江到西江流域（主要是湖南东半部和广西东半部）一带是它的西翼。

（四）江淮间的一带（大致包括苏北、皖北、鲁西、河南中南部、鄂东部）是它的北邻。

五

在上述四大片范围内，根据近年工作积累资料，已进行过若干分期、断代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探索，对于它们之间诸不同阶段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做过若干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参考这些成果，谈些我的初步看法。这次着重谈鄱阳湖周围的江西北部地区。

鄱阳湖、赣江、北江一线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要道之一。这一带的四周都是我国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这一地区古文化中“几何形印纹陶”发达，共性较多，但粤北地区和赣北地区又有所不同，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各异，应该加以区别。

江西北部围绕鄱阳湖的万年仙人洞、修水山背、清江筑卫城、清江吴城、九江沙河磨盘墩、大王岭等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地区从原始社会到先秦这一期间古文化编年、分期、断代，社会发展诸阶段，以及文化特征性质诸问题的依据。作为这一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化特征之一的几何形印纹陶，包括上述三类印纹的发展序列比较完整，比较突出，是其它地区比不上的。

万年仙人洞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的连续性是清楚的，阶段性也是清楚的。下层陶器仅有夹粗砂、粗绳纹（有的内外壁均有）、颜色不纯、形制简单的一类，复原了一件直口圜底“釜”，在绳纹上有用工具戳打的圆凹窝，有用工具刻划的方格。上层陶器以夹粗砂红陶为多，但有夹细砂或其他属和料的，有泥质红陶，还出三片灰陶，一片为泥质篮纹，两片为夹砂绳纹，绳纹比下层出的较细，只外壁一面有，有直口“釜”类器，口沿呈锯齿状，底部形状不明，口沿外在绳纹上也有用工具戳打的圆凹窝，一块平底器底部有用工具刻划的方格

纹。曾用下层出的兽骨和上层出的贝壳测过年代，数据与层位矛盾。可以认为两者的误差都较大，也可以认为其中一个误差较大。这无碍于我们把这两层堆积作为江西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下层的陶器制作工艺还接近最原始阶段，上层的陶器制作工艺则有了进步，器类有了分化，但还没有出现作为我国东南部古文化发达地区在新石器早期较后阶段（约距今六、七千年间）就已经出现的三足、圈足或支座器类的分化这一特征。因此，上层的年代下限估计要早于距今六、七千年。它的上、下两层所代表的两个阶段之间是紧密衔接，或是中间有缺环，还有待于今后的工作加以解决。它与修水山背下层、清江筑卫城下层之间存在相当的间隔看来是比较清楚的（后者的年代上限估计约距今五千年左右）。这段空白尤其希望早日填补起来。

六

根据现有资料，在江西北部地区范围内出土的使用印模戳打或拍印的几何形印纹陶中，修水山背下层和清江筑卫城下层出土的较早。

修水山背下层出土的有：夹细砂红陶上拍印细线阳纹方格，夹细砂红陶上拍印细阳纹平行曲折线纹。

清江筑卫城下层出土的有：泥褐陶上拍印粗阳纹方格，夹砂褐陶上拍印粗阳纹平行曲折纹因交错重叠而类似“雷纹”，夹砂褐陶上拍印（或戳打）细线多层阳纹重圆圈，夹细砂红陶上拍印（或戳打）阴纹圆圈（径约1.2厘米）。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些几何形印纹陶能代表这一地区的最初形态，更不能据此确定它们最早发生的时间。浙江吴兴钱山漾下层和邱城中层出土的豆类圈足上拍印（或戳打）雷纹或类似雷纹（还有重菱形或回字纹），说明这种工艺技术的发生时间可能比

修水山背下层和清江筑卫城下层要早些，但相差不远。因此，有些同志估计这类工艺技术发生的时间大约距今五千年上下。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艺是怎样产生的呢？

苏北邳县大墩子中层墓、山东兖州王因墓、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大汶河北岸墓地中都出有一种三足高柄杯，上面有用工具戳打的阴纹圆圈。它们的年代，在大汶口类型墓葬编年序列中的位置要早于袋足鬶出现的时间。而修水山背下层一号房子中则出有一件袋足鬶。它给我们的启发是：使用竹管或类似工具在陶器泥坯上戳打成行的圆圈的工艺技术的发生要早于修水山背和筑卫城下层那种使用印模拍印的多层重圆圈红砂陶，要早于距今五千年前。把它和更早的万年仙人洞下层与上层出土的使用圆棍状工具戳刺成圆凹窝的夹粗、细砂粒红陶工艺技术联系起来看，这种“由使用圆棍状工具戳刺成凹圆窝状——使用小竹管或类似工具戳打成阴纹圆圈——使用印模戳印成多层重圆圈”的序列似乎恰恰可以说明这类几何形印纹陶工艺技术发生的过程。这种工艺技术的发生时间虽然是新石器晚期，但它的孕育期则可上溯到新石器的早期。

苏北连云港市二涧村出的类似小球拍状陶印模（南京博物院藏）上面有刻划的平行线曲折纹、方格纹，同样也对我们有所启发。试把它放在万年仙人洞与修水山背下层两者中间，在它上面刻划的方格纹可以说同仙人洞陶器上刻划的方格纹是同样的工艺技术，而在山背下层（一号房）出土的阳纹方格纹陶也可说就是使用的与它相同或类似的印模拍印的。同样道理，修水山背下层出的平行曲折线阳纹陶也就是使用与它相同或类似的印模（刻划阴纹平行线曲折纹）加工而成的。苏北鲁南发现的这些与几何形印纹陶工艺技术发生发展有关材料，在年代上和工艺技术上恰恰填补了在赣北地区存在于万